

从四方面防范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任寿根

金融危机是指一国金融系统发生崩溃、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大量金融机构倒闭的一种经济现象。如果一国发生货币短期内大幅不可控性的贬值、股市出现崩盘、房地产崩盘、银行大量倒闭继而发生挤兑、外债危机等几种金融现象中的一种或多种,则该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而若一国金融危机波及他国,就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其前提为该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大,与他国相比其主要经济指标占比较高。

风险经济学提出“爆破”金融危机理论,

指出金融危机突出特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突发性,纵观历史上爆发的历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突然爆发;二是剧烈性,比如股市在短期内出现连续性的暴跌,房价出现连续性的暴跌;三是由偶然事件引发,历史上爆发的所有金融危机都是由偶然事件引发,比如2020年3月股灾由不可预知的疫情以及石油大战引发,这两个事件均为突发性的偶然事件,事先难以预知或不可能预知。“爆破”金融危机理论还指出金融危机的主要标志为包括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大量金融机构出现倒闭,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

因恐慌出现崩盘式下跌,最严重时出现大量银行挤兑现象。

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发生过诸多次金融危机,至今为止最大的金融危机为1929年至1933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这之前以及之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不如那次危机对经济、对财富的伤害大。在那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失业率最高时到达25%,而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失业率最高时为10%。

但如果再度爆发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就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危害就有可能超越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因为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爆发之前的股市楼市规模等无法与2020年的相提并论。

次贷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行大量钞票,其股价、房价屡创历史新高,楼市泡沫、股市泡沫累积之后相当大。自2009年至2019年,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国际上滋生了两大大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股市大泡沫和房地产大泡沫。美国道琼斯指数

经历十年大牛市,达到接近3万点的高位,其他不少国家的股指也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在这过程中,科技股股价走出一波大牛行情,一些科技股股价不断达到新的高度,累积的泡沫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泡沫。自2009年至2019年,不少国家的房价暴涨,特别是全球性城市的房价更是涨到让人看不懂的地步。

从国际金融危机史来看,历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货币供给存量、房地产价值、股票价值都无法与2020年相比。由于经过2009年至2019年十年巨额的货币供给量,一旦出现楼市股市崩盘继而引发大量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倒闭,救市增量资金相对天量的货币存量资金以及巨大的房地产价值和股票价值而言可谓杯水车薪,难以扭转风险局面,顶多起个缓冲作用。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美国道琼斯指数自2020年2月21日29000左右的高点,至3月23日跌到18000多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跌去1万多点,跌幅巨大,对投资者心理造成巨大冲击。自2020年3月9日至3月18日,10天内四次熔断,而到3月18日美股史上总共五次熔断。更为震撼的是,据新华社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月15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个百分点到0%至0.25%之间,并启动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除此之外,美联储还宣布将从3月26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零,但投资者并未受其所动,3月16道指居然暴跌近3000点,创出史上最大跌幅,并创1987年股灾以来最差表现。美股如此剧烈的暴跌,

且跌幅创出史上最深,与美股点位达到历史新高,进入股市的资金达到天量,股市泡沫巨大等密切相关,此外,在市场出现恐慌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奏效,至少短期内是如此,这时其实需要财政政策介入,特别是财政支出性政策。

在此次美股暴跌期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股市也同样出现暴跌,对全球经济和居民财富造成巨大冲击。按照历史经验,股市暴跌之后,接下来楼市会出现大的问题,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以及次贷危机等都是如此,所以,本轮股市暴跌之后,更令人担心的是,接下来,全球性的楼市泡沫会不会破裂。如果全球楼市一旦破裂,对全球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更大,因为,进入全球楼市的资金规模更大,已经达到历史上最大规模,而楼市直接捆绑银行体系等金融机构。

防范或应对可能爆发的历史上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世界各国政府应建立巨额的特殊风险防范基金。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爆发金融危机,私人部门在几何级数逆模仿效应下,会丧失投资信心,不会投资,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部门应建立特别风险防范基金,在必要时向市场注入资金,扩大政府投资,甚至可以参与购买金融产品等。

第二,主要经济体在必要时应成立临时性特别风险防范国际协调组织。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依靠单一国家抵御的效果远不如世界各国采取协调性措施共同应对的效果,国际上应建立临时性特别风险防范国际协调组织,协调世界各国的风险应对政策和机制。

第三,世界各国应充分借鉴并采用历史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历史上已爆发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经济理论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世界各国也已经积累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将这些理论和经验教训运用到应对这次危机上来。

第四,引导困境资金(困境投资是指投资者在经济衰退期间或在经济危机期间,将资金注入困境之中的企业或购买资产的一种“抄底式”投资方式)进入市场维稳。市场上困境投资者的行为起到的示范作用巨大,对市场的维稳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采取措施引导困境投资者加大投资力度。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后)

老字号需靠创新转型增添内生动力

吴学安

非遗传承人在直播镜头前泡茶、纳鞋底、鉴宝,大师们在镜头前一亮相,竟变身带货能力可观的“小哥哥”“小姐姐”。吴裕泰、内联升、潘家园……如今,北京一半以上老字号已入驻淘宝直播,开网店、做直播、运营粉丝社群、迭代产品,突如其来的疫情下,北京的老商圈、老字号加速数字化转型突围。

在很多“老字号”企业经营者的眼里,“老字号”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长期的历史沉淀已经为企业积累了无形的品牌资产,是企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但他们恰恰忘记了品牌是存在于消费者心目中的,是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价值认同,“老字号”品牌价值量的大小并非企业所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和市场所决定的。不少“老字号”由于长期忽视品牌经营和建设,躺在所谓的“金字招牌”上不思进取,吃老本,结果往往招致“老字号”品牌文化积淀损失殆尽。

一个品牌只有靠不断延伸才能不断壮大,而老字号却很少学会用现代经营方式去拓展市场,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先辈们“打江山”时的模样。由于老字号小规模生产难以满足消费档次需求的提高,大大限制了老字号的扩张。老字号也有知识产权,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利”,只是一种专有技术,由于只在家族内部继承和享用,必然大大限制其规模扩张,也会造成侵权之害屡屡发生,从而危及老字号的生存和发展。

老字号及其经营的传统商品,是众多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经过悠久岁月凝聚起来的艺术杰作,也是商品市场优胜劣汰的产物。老字号作为城市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情感诉求,而且其经营理念、质量意识、商品特色,对于繁荣经济丰富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因此,充分挖掘老字号的传统风格、传统技艺,延续它的历史渊源,维护其“正宗”名誉为极为重要的。老字号在发

展过程中应该珍惜企业文化、品牌潜质,不能采取“卖名牌”方式发展自己,以免影响正宗商业老字号的声誉和信誉,同时,老字号更应发挥文化本体的辐射力,吸取现代管理经验,充分挖掘竞争与创新潜力,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使老字号魅力弥新,名不虚传。

老字号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沉淀出的是最精华的东西,其字号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倘若老字号能找准市场定位,顺应市场的变化和新的消费需求,仍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现代商贸企业一个重要的经营业态就是连锁,连锁经营能够实现规模化效应。而解决规模化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是首要问题,联手其它企业或募集公共资金就是最好的筹资方式。如北京同仁堂通过改制上市后,募集相当多的社会资金,企业完全采用现代化经营方式,使这家老字号重新走向辉煌。不言而喻,老字号若想“重振旗鼓”,关键在于能否将老字号中的精华部分通过产品升级换代,慢慢形成中高档的消费品,从而走出一条现代化、规模化的经营新路。

毋庸置疑,“老字号”要应对“生存危机”,就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进特许经营和连锁经营等现代经营业态,加强标准化建设,学会借助“外脑”。对于缺乏技术含量的“老字号”来说,品牌和服务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老字号”要想形成固定的消费群体,就必须做足“文化戏”,除了不断挖掘和弘扬“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外,还需要输入新的文化元素。“老字号”在管理模式下,“老字号”也需要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理念,通过专业、系统和标准化的服务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一方面,“老字号”在奋发图强的过程中更应珍视固有的企业文化、品牌潜质,充分发挥“老字号”文化本体的辐射力,吸取现代管理经验,适应市场发展需求,使“老字号”魅力弥新,名不虚传。另一方面,“老字号”要想图存求强,就必须切实转变观念,在创新发展上做好文章,大力培养人才,力争走出国门,不等不靠,学会靠挖掘自身潜力做大做强,才是“老字号”绝处逢生最佳良策。

“2020 奥运会”命运仍存变数

木木

受加拿大、澳大利亚带头“造反”的影响,“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终于在主办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共同“推动”下,“主动”延期至2021年夏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毕竟当下世界最大的关切是抗疫。

对主办国和国际奥委会而言,虽然推迟举办约略也能算是“次优选择”,但由此而来的损失还是极为巨大。就经济方面而言,有专家推算,延期一年的损失,将达到6400亿日元,这还主要是延期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括奥运场馆、设施的持续维护费用,运动员的训练、再次选拔支出等;如果考虑对旅游的负面影响,2020年日本GDP将损失1.7万亿日元,若考虑更广泛的奥运会辐射效益的灭失,今年日本的GDP损失有可能达到3.2万亿日元。

专家对经济损失的预测数据很多,但定性大致差不多——都是损失巨大,而且这还是延迟一年举办形成的损失,如果最终被迫取消这届奥运会,据估算,日本的经济损失将达4.5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之外,能让人有锥心之痛的损失其实还有许多,比如,对日本经济、社会全面振兴计划和雄心的阻扰,对全球体育赛事、体育产业、体育组织体系扰动造成的损失等。

据媒体报道,明年夏季的重要国际赛事包括:欧洲杯、美洲杯、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游泳锦标赛、环法自行车赛、足球世界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举重、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的世锦赛。这些重要国际赛事应该都将受到奥运会延迟的影响,由此带来的连锁变动——商业、运营等方面的——造成的各类损失,将很难做出准确评估。

仅以中国为例,足球世界杯和 world 大学生运动会原计划明年夏季

在中国举办,再加上同档期的全运会,几乎可以肯定都要为奥运会让路,由此造成的损失,辐射很广。另外,按照往届奥运会惯例,许多“附属”小商品——各国的国旗、T恤、玩偶、小喇叭之类——的生产,或启动、或已经完成,随着奥运会的推迟,这些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就目前疫情发展的严峻形势看,“2020奥运会”能不能在2021年办成,确实还存在一定的变数。比较关键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其一,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尚未有明显的见顶迹象,疫情将牵连多长时间,最终造成多大的伤害,后续影响有多严重等,目前都很难估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奥运会的命运;其二,随着南半球秋冬季节的到来,疫情在这一地区不会趋于严重,甚至严重到现在北半球的地步,也会对疫情未来的发展做出一定程度的预示,如果真的日渐严重起来,全世界的疫情很可能跨年度,奥运会办不办的问题,到时等于又回到了原点。

前两天,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也表示,就目前形势看,全球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的概率很低。因此,如果“疫火”不能在7、8月间在世界范围内被扑灭,就有很大概率形成跨年度的蔓延燃烧,一旦拖延到明年的此时,“2020奥运会”何去何从就又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2020奥运会”的命运,显然决定于“新冠病毒”的死活。在全世界同“新冠病毒”的斗争形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2020奥运会”的命运当然就存在一定变数。方方面面对此显然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肆虐的病毒,现在显然还不是考虑损失的时候,应该先集中全部精力,彻底扑灭“疫火”。扑灭“疫火”,是全世界继续正常生活的基础;奥运会属于锦上添花的事情,“正常生活”是其存在的基础,明确了这一点,内心困了巨大损失而产生的纠结,或许会稍微好一些。

为何楼市频现政策“放短假”现象

谭浩俊

近一段时间以来,借着疫情发生的机会,很多地方出台了新的楼市政策,或对开发商予以政策支持,或对涉及土地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或在房屋预售方面政策放宽等。同时,也有一些地方想在楼市调控上做文章,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但是,很快地就收回了政策,给政策放了一次“超短假”。

如河南省驻马店市提出的将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房首付比例降低至20%;广东省广州市明确商服类项目未完成规划报建手续的不再限定最小分割单元、商服类项目不再限定销售对象;陕西省宝鸡市要求银行积极争取降低首套房贷款首付比例政策、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40万提高至50万;山东省济南市在先行区直管区范围内购买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商品住宅的,不受济南市限购政策约束,等等。

那么,为什么会频频出现楼市政策“放短假”现象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

探究的问题。

目前的楼市调控政策,有这样几个关键点,或者说关节点。一是“房住不炒”的定位;二是因城施策、分类调控的方法;三是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手段;四是“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要求。

定位即目标,就是房价稳定。因为,只要房子回归到居住属性,而不是投资、更不是炒作,房价就不可能大起大落,不可能快速上涨、特别是持续上涨,而会依据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平稳有序地上涨或下降。所以,“房住不炒”的定位,实际就给楼市调控目标定了调,给地方政府定了位,给广大居民定了心。方法也好、手段也罢,都是为目标服务的,为定位提供支撑的。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要求,则是给地方政府一个明确的导向,不要再指望通过房地产来拉动政绩、拉动增长。房地产只能作为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去发展,而不能赋予房地产更多特别的

含义,尤其不能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推动地方政绩的根本手段。

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关键点,楼市调控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成效,房价才能逐步进入到稳定有序的轨道。如果轻易地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可能会带来房价的不稳定,并有可能带来新的影响。中央有关方面在疫情影响尚未消除,甚至是刚刚开始的情况下,就召开相关会议,进一步强调楼市调控的重要,进一步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要求,就是意识到有些地方又想动房地产脑子的苗头。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些地方在楼市政策上“放短假”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地方不想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调整,而是不敢去触碰这条高压线。因为,他们自己也把握不住,如果对政策进行调整,会不会带来房价的反弹。别的怕,怕就怕房价反弹。房价一反弹,管理层必然会约谈,甚至问责。毕竟,多少年才逐步积累起来的调控能量,才取得的调控成效,如果因为部分地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18@126.com。

给流动摊贩出口为疫后城市注活力

谢军

在成都,摊贩可以临时占道经营;在南京,甚至有领导干部带头消费;在陕西,商贩在特定区间流动经营……诸如此类措施,为激活疫后社会经济活力、提振消费信心按下“启动键”,也为返城务工人员提供了便利化服务。

的确,不管允许商贩占道经营还是允许摊贩在特定区间经营,都是疫情防控期间的阶段性举措。但是,做小生意、小买卖的人群收入并不高,大多是城市中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人群,如入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待业对象及流动人口。他们一个月挣得并不多,但却撑起整个家的生活开销,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冲击不难想象。允许他们在路边占道摆摊经营,既解决了家庭生计问题,也为其他居民提供了便捷服务。

在疫后复工复产特定背景下,允许摊贩在城镇特定区间经营,既体现了城市治理温度,也激活了城市活力。无论是路边摊贩、游走商贩,还是基于此形成的街头巷尾的各种小吃门店,都是城市文化与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游走小商小贩的吆喝、路边摊的喧嚣,乃至餐饮店里人来人往,都能让老百姓直面感受到城市繁荣与活力,扩大就业、助力复工复产与刺激消费。

实际上,这种对小商小贩“高抬贵手”的做法,也与各种刺激复

工复产激励措施不谋而合。除了在疫后复工复产特定时期,即便是在今后正常时期,我们要为流动商贩保留生存空间,让他们感受到城市治理的温暖,而不能成为城市“调辙之驹”,甚至逼迫他们退出城市舞台。今后,治理者要在提炼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形成完善的流动摊贩监管机制,允许并引导他们在特定空间内依法依规经营。

也应看到,由流动摊贩衍生的治安、环保等系列问题不容忽视,城市治理者对此不敢随意开口子,也可以理解;而群众对流动摊贩感情复杂,买菜时方便,走路时嫌堵、嫌乱。允许流动摊贩在特定空间内“自由活动”,相关配套治理措施必须跟上,比如,在部分街道分时段分区经营合理、合法,合规组织各类经营活动温情执法,等等,以满足更多市民和摊贩生活需要,更好地提振消费信心,繁荣市场经济。

城市治理创新应多些服务与关怀,少些门槛与束缚,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而对待流动商贩态度的转变,便体现了城市的治理模式创新与开放包容。流动商贩也是城市居民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是城市社区带来生机活力,也延伸了城市文化建设触角。我们应保全小商小贩的谋生之路,让依法依规经营的摊贩在城市舞台上绽放异彩,为市民群众烹制一席别具风味的边界盛宴。城市相关部门应对流动商贩少苛求、多体谅,让他们感受到城市治理的温暖。